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三九）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〇三期 ——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十五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411c)

【读史笔记】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读《仰天长啸： 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姜 弘
【史海钩沉】“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张光璘
【学术争鸣】文革的标志、客观作用与史学价值	陈益南
【当事者说】“三号首长”	金敬迈
【史料存真】周恩来的“政变经”	余汝信
【微观历史】周恩来三保康国雄	何 蜀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史笔记】

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读《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

• 姜 弘 •

〔编者按：鲁礼安著《仰天长啸：一个被单监十年的红卫兵狱中吁天录》一书将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关于鲁礼安在文革中的活动，请参看宋永毅等著《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一书第七章“武汉‘北、决、扬’：马克思主义不同政见的深化”，载本刊 z k 9 9 0 8 a 。）

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了近三十年，我才读到第一本完整的个人回忆录，而且这样真实生动，把人带到了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的那个疯狂的年代。我原来曾想，文化大革命是无法如实描述的，因为那一切太离谱，太不正常了，真实的不正常有可能成为漫画，使人感到荒诞。然而，读了鲁礼安的这本书，我改变了看法。也许因为我是过来人，而且曾参与过有关活动，所以读时如同回到了当年，一切都重现眼前，感到真实而亲切。这种真实感来自作者的真诚，他 不加矫饰地把当年那种无限崇拜、无限忠诚照原样再现出来了。说幼稚也好，说愚昧也好，或

者干脆说奴性也好，当年确实就是那样——鲁礼安给了我们一块“文革”的活化石。

“十年文革”并不是一段统一完整的历史，其间有许多矛盾和反复。总的说来，那是一场夺权斗争，但上层与下层并不一致：上层是争夺领导权，即特权；下层则是争取生存权，即人权。一开始的近半年时间里，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是有特权的“红五类”制造“红色恐怖”的时期。中间不到两年时间，是多年来受压的广大弱势群体为保护自己不受迫害，并进而起来争取生存权的时期，也就是造反派起来造反的时期。这中间，毛泽东鼓动人们造反的目的与人们自身的诉求并不一致。1969年以后，所谓的“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等等，是上层继续进行权力斗争并联手镇压造反派的时期。

说来可怜，造反派活动的时间不过两年，而他们的头头和主要骨干都受到了严厉惩处，且被后人说成是“文革”中所有暴行的制造者。这实在是冤枉，因为那些暴行和血案，主要发生在前后两个阶段，即一开始的“红色恐怖”中和后来的“清队”等有组织、有领导的镇压行动中。造反派当然也有暴行，但他们远没有保守派那样有恃无恐，在军队和各级政权的支持下大胆地“采取革命行动”。鲁礼安的独特之处，在于他自始至终是“君子动口不动手”的，号称“敢死队”，实际上他一直沉浸在逻辑和激情之中，所进行的是思想理论上的战斗。他那种理想主义倾向，他的辩才和勇气，吸引了许多右派。我和我的右派朋友常在私下里议论他，称赞他，因为我们从他身上仿佛看到了自己当年的影子。

在“文革”中，1957年的右派同情并支持造反派，这是普遍现象。我和我周围的几乎所有右派，全都站在造反派一边，其中知名人物有老作家姚雪垠、李蕤，诗人白桦、王采、秦敢，翻译家章其，著名法学家韩德培，还有此间的著名记者赵镕、刘若等等。这些人大都在运动一开始就受到了猛烈冲击，是造反派起来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们才得以解脱，成为游离于斗争旋涡边缘的“死老虎”。造反派对待我们这些人的态度也远比保守派温和。当时支持造反派的“中央文革”成员的有些讲话，如批判血统论，说十七年也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说右派摘掉帽子也是群众等等，这些说法都在我们心里引起了一丝希望，以为中央可能会重新审视以往的运动。当然很快就发现，这是错觉，是一厢情愿。

事实上，当时我们都已成为俎上之肉，随时随地任人侮辱摧残，是争取生存权和对民主的渴望，使得一些右派介入了造反派的活动。最突出的是公开站出来造反的诗人白桦，因为他是现役军人，保守派奈何他不得。1967年夏天，白桦常常出现在大字报栏前和一些群众活动场所。在“百万雄师”围攻造反派的武斗现场，他一个人面对大批暴徒，与之辩论，营救被围困的造反派学生。他的组诗《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充分反映了造反派群众那种追求民主、反抗暴政的意愿和激情。这些诗被抄成大字报贴遍武汉三镇，传颂一时，脍炙人口。这些诗印成小册子以后，他亲自在街上散发。一次我遇见他，向他索取，他答应过几天给我。几天以后，他到文联大院来，把诗集送给我和徐迟、姚雪垠。徐迟对这些诗评价很高，他伸出拇指说：“全国文艺界头一份！”

连老作家姚雪垠也并未完全置身事外，而是以曲折隐蔽的方式表示对造反派的支持。1967年春天，造反派被镇压，军区发布《三二一通告》，取缔工人造反组织，把学生从《长江日报》的红旗大楼赶走。一时间，武汉三镇一片沉寂。对此，姚雪垠怀着悲愤的心情，一连写下了二三十首七言律诗，并加了一个小序，油印成小册子，偷偷散发出去。小序称：“三二一”以后，红旗大楼前人迹寥寥，大字报全被撕毁，纸屑飞扬，一片凄凉。他于无意间发现海关大楼旁有一组小字报，直行书写，虽已残破，尚可辨认，竟是一组七言律诗，而且格律谨严，对仗工稳，因而不忍任其湮没，择可识者抄下云云。记得第一首里有一联是“武汉关前月色冷，钟声寂奏东方红”。中间有一首把这一年三月二十一日称为“新马日”，就是把军区镇压造反派比做1927年湖南长沙的“马日事变”——军阀何键镇压革命的工农群众。于此可以看出我们

这些人当时的思想感情倾向。

像这样暗地里支持和帮助造反派的人很多，鲁礼安提到的造反派小报《五千里狂澜》，他称赞的报头五个气势磅礴的大字，也是右派写的，此人就是武汉歌舞剧院的音乐家王同善。我自己也参加过一些活动，帮助他们办过小报，还参加过“钢工总文艺分团”的活动，这个组织的头头王振武和鲁礼安有交往，思想观点接近“北斗星学会”和“决派”。

当年有一种说法，说右派“人还在，心不死”，时刻梦想资本主义复辟。不知道这话是毛泽东还是康生说的，反正一样，他们二人至死都是一致的。这话并没有错，他们所说的“资本主义复辟”无非是讲民主、自由、人权，而这正是五七年的右派和“文革”中的造反派所追求所梦想的。我和我的朋友们注意并赞赏鲁礼安和他的《扬子江评论》、《北斗星学会宣言》等，是发现他们抓住了当代中国的两个最重要也最敏感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正是1957年“鸣放”中的关键问题，这就是实行民主和解放农民。当年在武汉大学的大字报栏上就有这样的醒目大标题：“争民主，争人权！”、“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鲁礼安他们呼唤巴黎公社原则，关心农民的现实处境，把这两个问题联系起来了。巴黎公社原则就是彻底改变政权性质，实行直接民主；在中国，最需要这种变革的，就是压在最底层的最广大的弱势群体农民。当时对于他们的这些思想和主张，我和我的朋友们是赞赏和佩服的。但同时又为他们担心，感到他们已闯入了禁区。他们不知道，我们当年就是在这些问题上犯禁而罹难的。因为这个问题是毛泽东所最忌讳的，作为几亿农民的皇帝，他不允许任何人代表农民说话，更不允许给农民以自由。就像马克思所说，他要保持农民那种“一袋马铃薯”式的生存状态；合作化也好，公社化也好，不过是把麻袋变大些罢了。他不许“走资派”在农村搞“三自一包”，是担心农民冲破麻袋在地上生根发展，变成社会公民，危及他的皇权。鲁礼安不知道，巴黎公社式的民主，是只可以说说而不可以去做的，他的主张不但触犯了皇帝，也为各级官员所不容。当时，姚雪垠就看出了这一点，说他的思想很危险，会吃大亏的，要我千万不要介入他们的活动。当时，我们这些人既同情、赞赏鲁礼安，又为他的命运担心，如前所述，因为我们从他身上看到了我们当年的影子。

白桦的那本《迎着铁矛散发的传单》里有一首诗，就是表现这种心情的，里面有这样的诗句：“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 那时的战友 / 就像今天的你们”。下面他描绘了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队拼杀的场景，但在我心里、在我眼前，出现的却是1957年“大鸣大放”中的情景。和别的右派说到这一点，都有同感。我没有问过白桦，但确信他也会同我一样，心里想到的是1957年为民主而进行的斗争，笔下却只能这样写。1957年的我们和1967年的鲁礼安们，不是都像毛泽东所描绘的那样，“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谁又曾料到后来的“风云突变”呢？1971年林彪事件以前，我对毛泽东有怀疑、有不满，但还没有看清楚，是《571工程纪要》起到了启蒙作用，好像对我猛击一掌，使我突然清醒过来，开始认识毛泽东的真面目。

十几年以后，当我再见到鲁礼安的时候，我已年过半百，他的青春也已逝去，成了中年人。那是在一次美学讲座课的中途休息时间，他来听课，并向我提出圣经与文学的关系问题。回来后，我向朋友们谈到他的情况，都不胜感慨也非常同情。——可谁又想得到，历史好像在兜圈子，几年以后，我们和他们，鲁礼安们，又同时在心里产生了“我们也有过这样的青春”的感喟！

那是1989年5月，在武汉召开全国首届胡风思想学术讨论会，会议将要结束的时候，传来了北京学生在天安门前绝食的消息。于是大家的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北京，听广播、看电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大家兴奋激动，议论纷纷，有人担心，有人怀疑，绝大多数人是欢欣鼓舞的，因为这是专制制度之下不可能发生而民主社会里常见的正常社会现象——也许，中国社

会从此将走上健康的民主发展的大道。正是出于这样的心愿，我和许多人都在文化界支持北京学生的声明上签了字。其中有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胡风分子，有像我这样参加过四十年代末的学生运动的右派，也有“文革”中造过反的中年人。面对电视画面上那滚滚的民主浪潮，燃烧的青春火焰，那热情激荡而又秩序井然的动人景象，自然都会在内心产生感应，联想起过往的岁月——“我也有过这样的青春”……

我不知道当时鲁礼安在哪里，处境如何，但我相信他也会有同感。因为发生在上世纪下半期的这三次重大历史事件——1957年的“鸣放”、1967年的“造反”、1989年的“风波”，其间尽管有许多不同，但在反专制、反特权，争民主、争人权这一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是前后呼应的，或者说，这是三次被切断了民主运动。

1957年的“鸣放”，是一次夭折了的思想解放运动，是五四精神的一次回光反照。当时提出的问题既深且广，远超过以后的两次。特别是储安平的“党天下”，真是一针见血，一语道破了中国现实的本质，揭示出中国社会各种痼疾的真正症结所在。三十年后的89民运，所提出的基本诉求虽然并未超过当年的“鸣放”，但目标明确集中，都是有可操作性的现实问题，更富有实践意义，而且声势浩大，影响深远。时至今日，这两次民主运动的性质和意义已经为历史所肯定，稍有良知的人也都明白了事实真相，“扩大化”、“动乱”之说也早已无人理会了。

现在的问题是，对于夹在这中间的“文革”中的造反运动，对于参加那场运动的鲁礼安们，今天究竟应该怎么看？我认为，“文革”中那场造反运动与前后两次民主运动的不同是很明显的，一是性质不同，二是思想资源不同。表面看来，“鸣放”与“造反”都是“响应号召”，都是中了毛泽东的“阳谋”。但二者有重要区别：右派是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和主张而为毛所不容，才“因势利导，聚而歼之”的。造反派则不同，他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忠诚，是被愚弄、利用之后又被抛弃的牺牲品。1957年的那场斗争确实是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在野的知识阶级与掌了权的阿Q之间、五四新文化传统与游民造反传统之间的斗争。1967——68年的造反运动则比较复杂，即是那次内讧中的一次反复，又是受压群众的一次自发抗争。

说到思想资源的不同，主要是历史环境的不同造成的。右派的思想里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而且有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观念，这与他们早年所受的教育、所受五四精神的熏陶有关。造反派就没有这种精神资源，他们生长在严格封闭的单一思想文化环境中，所能接受的只有一种意识形态，就是“毛主席的教导”。不应该忘记那场轰轰烈烈的“学雷锋运动”，那是一场造神运动，愚民运动。雷锋精神的核心是什么？就是林彪为《毛主席语录》题词时所书写的那几句雷锋日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就是听话，效忠！而那本由空洞的豪言壮语拼凑而成的《雷锋日记》，则是由中国作家协会书记郭小川精心修改加工出来的宣传品。就这样，一本语录，一本日记，如同两个轮子，人们就是踏着它们滑进那个疯狂年代的。

鲁礼安们的不幸和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们因受压而反抗，而独立思考，从而冲破思想禁锢，从毛泽东走向马克思，反过来质疑现存制度，而且不顾伟大领袖的战略布署，自己组织起来去探索新的革命之路——走向民主之路。他们当然没有想到，这就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就是反对伟大领袖毛主席，就是反革命。然而，正是在这里，他们遇上了1957年的右派，他们之间的思想观点相近，精神上相通，而且这种相近、相通的东西一直延续到1989年。上面谈到的右派对这两次历史事件的态度，就说明了这一点。可惜的是，这种相近、相通之处未能相互传承，积累发展，并上溯到五四源头，进行认真的研究总结。

如今，一切都过去了，成为历史了，但是有关造反派的真假是非问题并未弄清楚，人们还没有把“文革”中的施暴者与受害者（牺牲）区分开来，鲁礼安的这本书有助于解决这一历

史公案。书里有一个附录，注明了有关人物的基本情况，那些曾经为武汉人所熟悉所关注的活跃人物，那些造反派头头，不是悲惨的死去，就是沦落到了底层。——前两年我曾在街头遇见当年和我一起办报的那个“中学红联”的小刘，那个精明活泼的中学生，如今已是个形容憔悴的中年人，正在为下岗后的生活而奔忙。是他认出了我，我却认不出他了。当时，我不由得联想到鲁迅笔下的闰土，心里戚戚然无言以对……

这样的人很多很多——“八九点钟的太阳”，火样的青春，被愚弄、被利用、被毁灭了，反过来又要承担沉重的历史罪责，这也未免太不公平了。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此，历史的发展总是要有人付出代价，作出牺牲的；问题在于，是用这沉重的代价掩盖历史真相，还是用以换取真正的历史教训？鲁礼安的这本书既是不平之鸣，更是揭示历史真相，提供第一手可靠资料。至于反思、忏悔、评判，那是以后的事。

以上是我读这本书时的一些想法。我已经年过古稀，鲁礼安也已经年近花甲，我们都老了。人老了，去日无多而往昔的记忆甚多，回忆是老年人的特长和专利，所以常常向后看。由此，我又想到了那个养老经，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以健康为中心，潇洒一点，糊涂一点”以及“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等等。对此，我不敢非议，只想修改一下，是为“潇洒一点，清醒一点，老有所思，老有所为”——独立自主，无所顾忌，回忆我们曾经有过的青春，像鲁礼安这样，如实地记录下来，留给后人。

二〇〇四年中秋之夜于武昌东湖

□ 原载“新世纪”网站

~~~~~

## 【史海钩沉】

###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

• 张光璘 •

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

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

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

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与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佩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

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

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

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佩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

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5月中旬，曹轶欧在驻地友谊宾馆与聂元梓、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

化大革命问题。聂、杨等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虽有翻案之心，但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一些心灰意冷。可是，当他们读到《五一六通知》以后，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感到《五一六通知》里讲的话，正是他们当年想讲而未能讲出的话，只不过《通知》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罢了。顿时，他们意识到，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的时机来到了。曹轶欧还两次约北大党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陈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的。”但是，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最后，曹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严格保密。”（《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以下有关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资料、数据、日期等，凡参考《北京大学纪事》的，不再一一注释。从他处引用的，另加注。）

5月23日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修改，聂元梓最后加工定稿，并第一个签了名。

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彖、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中字报：《宋硕、陆平、彭佩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

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

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中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革命运动，同时向北大党委宣布约

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

6月2日，首都各报均全文登载了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以《北京大学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一个大阴谋》为题，全文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并配发了关锋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说：“为陆平、彭佩云等人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并说：北大党组织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你们的‘组织’就是反党集团，你们的纪律就是对无产阶级革命派实行残酷无情的打击”云云。这篇评论员文章同时还说：“凡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指示的，不论他们打着什么旗号，不管他们有多高的职位、多老的资格，他们实际上是代表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利益，全国人民都会起来反对他们，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纪律彻底摧毁。”这段话实际传达了这样的信息：毛泽东的指示，他本人的思想高于党的组织纪律，号召人们打破原有纪律的约束，向任何反对毛泽东的人进攻，不论其职位有多高，资格有多老。

6月2日以后，北大校内形势骤变，聂元梓等人以“革命左派”身份，向“围攻”他们的人展开了猛烈反击，整个校园内更加混乱。

6月4日，吴德代表北京新市委宣布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领导北大文化大革命。（二）撤销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佩云的一切职务，并改组北大党委。（三）在北大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称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这个结论在北大又投下一颗炸弹，令北大师生员工感到瞠目结舌。社论一发表，北大内部就围绕这一历史旧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聂元梓一派人曾对曾在国际饭店会议上不赞成他们观点的人进行打击报复。

从6月1日至6日，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张大字报，每天来北大看大字报的人达十万人之多。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除哲学系外，全部陷入瘫痪。

~~~~~

【学术争鸣】

文革的标志、客观作用与史学价值

• 陈益南 •

（一）广泛和有特色的群众运动，是文革的一个大标志

文革虽然历经十年，发生了很多的事情，但之中，足以成为文革标志事件的，却应该是广泛、深入的，并极有特色的群众运动。

文革中，即使是权力斗争，也多数与争取群众舆论过程相关。

并且，正是由于没能看到这一点，因而，现在很多人实际上是没能理解到文革的实质。

因为，现在相当多说论文革事的人，对文革中的那场群众运动，绝大多数是陌生的，不了

解的，即便知道的一点，也是不全面的，支离破碎的。

什么不民主，搞专制；整知识分子，整不同意见的干部，镇压不同政见的群众；搞极左，还有权力争执与角逐……等等。但是，这些，其实并非文革的特征，因为它们并非在文革中才有，而是老早就存在（例如一九四二年的延安整风、一九五四年抓胡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运动、一九五九年整彭德怀等），甚至，很多现象，现在也还可见到。

文革中，在发生这依旧的一切之同时，却发生了大规模的急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而且，这些运动中的很大部分，是指向当权的官僚阶层的。

所以，说到文革，只谈上述极左情况，而撇开以派性斗争为外在形式的群众运动，那实际便还是对文革了解的片面。因而，对其所做的任何其评论，则还不能算是全面。

人们都同意要否定文革。

但，其实各人心中想否定它的内容与本质，却并不一样，也许，还天差地别。

例如：

社会贤达、知识分子中的名人们，是因为文革不仅践踏了很多知识，更践踏了他们的尊严，剥夺了他们优越的工作与生活条件；

几乎所有的当权派们，却是因为文革，使他们在文革中的不同阶段，都发生过使其一度王冠落地的经历，还蒙受了如被戴高帽子、被押上台批斗之类人格屈辱；

所谓“黑五类”们，则是将文革视为他们自一九四九年后长期被作为“贱民”，而丧失基本人权的最惨阶段；

今天忧国忧民的青年们，却是将杀害遇罗克、张志新等体现专制制度黑暗的事件，看成文革的主要特征；等等。

之中，有些人要否定的东西，甚至却是有些人想要实质保有的东西。

造反派之所至今也不能得到当权者的宽容，就是因为不论是继续革命理论导致的派性使然，还是因前十七年间及文革初期，饱受官僚主义压制迫害的怨气所致，那场造反运动，却确全是针对了当权者的，是在实践中触犯与损害了全体当权派（甚至有时还包括中央文革那班人）的根本利益的。

而胡风分子，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们，则不过是阶级斗争理论的产物，是观念的产物，顶多也不过是纸上谈兵的敌人，而其并没有真正具体触犯过当权者的根本利益。因而在感性上，他们较容易被纠正、获平反。

（二）文革，客观上有使社会加速前进的“催化剂”作用

例如——

（1）如果没有发生文革，使“阶级斗争”发展到在党内高层发生大清洗的登峰造极阶段，

那么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而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中国改革开放路线，会不会被提升到文革后的党与国家领导高层的议程上来？并很快达成共识，予以实施？

（2）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的领导者邓小平等一大批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若没有在文革中挨整，亲身体验一下无端竟可被整肃的那种专制体制的厉害，并且很长时间被流放到社会的底层（邓小平本人就被命令于到江西新建县的一个工厂，受改造性质地与工人群众一起呆了三年），那么，他与他们会不会主动提出与支持，要在政治上改革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多东西？

有人以为，改革开放是世界潮流，即便中国没有发生过文革，没有文革中挨整的邓小平、彭真等领导人东山再起而执政，中国也会实行改革开放、提倡法制观念。

对此，我们只要想想二点：

四人帮垮台后，华国锋为首的凡是派执政，但其宣称的路线是什么？——凡是毛主席说过的、批示过的，都要坚决拥护，继续执行！——就是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总路线仍然有效！

今天北朝鲜的金正日，相对毛泽东与金日成那一辈来说，是个“年轻人”，比老邓还要小37岁，但是他搞改革开放了吗？

社会的进步，在时间标尺上，没有必然的度量。如果不出现杰出的人物与巨大的事件来推动，在历史长河中，虽然该会发生的東西，终究也会发生，但在时间的度量上，有时，却关系到几代人所标示的春秋，将处于何种社会，何种人生。

（3）如果没有发生那场扣以“走资派”罪名，而将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都进行了一次巨大冲击批判斗争的文革造反运动，那么，文革前那种视任何大小党员干部都为神圣不可批评的观念（一九五七年的很多人，就是仅仅对党支部书记一类小官，有几句不恭言论，便被视为“反党”而整成右派分子的），会不会自动消除，而产生人们现在的民主意识？

文革前，对老百姓来说，党政干部都是大大小小的“诸神”。

文革中，除了毛泽东那个“尊神”以外，其他大小党政领导干部，却绝大多数被造反的群众，当成了入“另册”的“走资派”，动不动就面临被造反派群众批判斗争的危险，因而，他们的“诸神”地位从此跌落。而到文革结束，四人帮垮台，则连毛泽东头上的“光环”也不再耀眼，也从皇权般的神坛回到了人间。从此，在大陆上的中国人的心中，任何对政治之“神”的观念崇拜，永远不再。

此后，不论谁有此企图，对这一点，也都注定是绝不可复辟了！

所以，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并的确对中国这二十多年来的飞速发展立有大功的邓小平，他极明白这一点，去世后，让家人将他的骨灰撒入大海，而坚决不设“神位”。

对文革发生的主观原因及文革本身之评价，因现在很多史实真相尚不清楚，所以难免出现“瞎子摸象”式的片面性。但是，对文革产生的客观作用与影响，人们则确可从文革结束后的这二十多年现实中，予以分析求证。也许，这种分析，还相对较易接近真理。

文革应确起了一种“催化剂”的作用，它使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下的中国社会，加速发生了很大的社会性剧变。因为，文革中，使很多东西，在短时间内都发展走向了极端，从而为“物

极必反”开辟了道路。

这种剧变，既不是毛泽东所设计，也不完全是邓小平的初衷。但邓小平那一代人，之所以能毅然决然选择了与文革前的观念并不相承的改革开放路线，应该说，文革的经历，是影响他们思想新走向的直接关键性原因。

历史的发展，常常会发生跳跃式前进方式。

而这个跳跃，须有二个条件：出现巨大的事件，伴有杰出的人物。

文革的灾难，以及正好是邓小平等人，处于受难者之中。

因此，中国便出现了一个新的巨大发展机会，出现了一个能大跨度一跳的历史性契机。

文革结束后，并不是所有在文革中挨了整的老干部，都会产生改革开放的念头。

相当多的领导人（包括最高层的某些人），对文革结束后的中国去向，仅仅是只想“返回去”，即返回到文革前的秩序中去而已，而没有从文革中显示的制度弊端中吸取教训，提高其对中国社会的认识。所以，这批人后来往往成为了改革的被动者。

由此，我们便理解到了，杰出人物对推动历史前进的重要性。

社会的进步，固然需要历史的铺垫，然而，如果没有杰出人物的出现，作为即时的第一推动力，那历史的铺垫，便仅仅还只是准备了一个舞台而已。

当然，邓小平虽然开创了中国的改革开放路线，但对这路线的发展又会带来什么副作用，以及如何来解决这些副作用带来的问题，时间既不可能让他一个年迈的老人完全认识与体察到，也更无法让他能参与解决。一代人只能做一代人的事。

苏联发生的事情，则刚好证明，没有发生巨大变故作历史铺垫的改革舞台，即便有人想推动一下社会前进，也是很难发生实质性变革的。

苏联没有进行过类似“文革”的社会大变动，在苏共十月革命建国近40年之际，虽然也发生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暴政的大批判，同时，开始了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某些改革。然而，由于苏联的制度性弊端，以及民众与这些制度性弊端的冲突，未能有机会得到充分展示与全面激化，因此，一方面，改革被不完全的改革者赫鲁晓夫政权自己用坦克镇压（在匈牙利、波兰）而自行窒息，另一方面，有限的改革被保守的官僚阶层所抵制而以全面失败告终。

因此，苏联人需多等待三十几年后，即在十月革命之后的七十多年之际，并在中国已基本成功地进行十年改革之时，才等来了戈尔巴乔夫的充满了动荡不安的大改革。

新中国在她成立的十七年之时，便发生了长达十年的文革；在她成立的三十年之际，即文革结束后二年之时，便发生了颇有成效、相对平稳的、尤其是很大程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的从经济开始的改革热潮。

因此，从这个时间表上看，文革，确有些客观加速推动社会前进的“催化剂”作用。

（三）文革，已只有历史学的意义

关于文革，因时间大师的作用，它无论从哪个方面讲，现在只能有历史与历史学的意义了。

即便将来的某时，有人欲再掀动文革历史的某些画页，也只能是为那时的某些人服务，而不具有真正文革的本来意义。正如，苏联发生剧变后，沙俄及托洛次基、布哈林等历史人物的幽魂，虽可重登舞台，但那顶多也不过是表演表演而已，却早不具有当年的意义。

因为，历史是人写成的。

写那些历史的人，若已被长长的时间抹去，那段历史的真实意义也就跟着消失了。

一九五七年的“右派分子”们，之所以还能改写他们的历史，那是因为他们重返舞台时，尚未“廉颇老矣”，而尚是壮心不已的暮年烈士。

然而，文革的参与者，绝大多数，不是已进入耄耋之年，就是已辞世西去，距今三十多个春秋的岁月，虽说也可视为弹指一挥间之短，但要消磨一段历史的意义，从实际社会中抹去一代人的有限影响，还是足足有余。

历史的前进，只能从将来的现实，而不是从过去的故事中获得原动力。

因此，对文革史的研究，应该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只会更大的体现在学术文化上。

至于文革历史的学术性，其对中国文化的总库，会有多大的价值，此时暂没有人能知道。我们唯一可以确定的便是：让真实的文革史进入学术文库，而不是无视它、抹煞它、曲解它，才可能体现人类的理智，更利于社会的发展从中获益。

文革，既然现在在人们心中，却并不是一样的内容，有的画面，还天差地别。

所以，目前，对文革历史的研究，似乎应先回到傅斯年的观点：历史学就是史料学。

历史的真相不清楚之前，就没有真正的历史学。连文革中到底还发生了哪些关键大事都不清楚、或还被人为遮掩或歪曲了之时，怎么能认识与正确评价文革？

2004年6月10日

~~~~~

#### 【当事者说】

“三号首长”

• 金敬迈 •

（编者按：长篇小说《欧阳海之歌》作者、部队作家金敬迈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调到中央文革文艺组任组长，为了维护“文革旗手”江青的形象，他按照江青的要求，把一些有江青三十年代旧剧照的电影杂志收缴上来封存，却因此惹下大祸，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关进秦城监狱。这是他在狱中的一段回忆。）

1967年9月20日上午，谢富治、吴法宪、傅崇碧三位负责人，受他们的上级的指派，来到沙滩北街二号，在我的办公室里撕开保险柜的密封条，从中取起走了首长（摘录者注：指江青）让我叫舒、刘二位收上来的那些“黑材料”，也就是四套三十年代首长演过的那五部电影的剧照和1933年至1936年的《电影杂志》合订本，大约也是四五套。

我把这些资料从保险柜里拿出来了，放在地板上，谢富治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肯碰一碰，叫我一个人把它们码成摞，用口袋装好。办公室哪儿来的口袋？我只好就手从窗户上扯下两块“派立司”窗帘，把它们包好。捆上绳子后，要我在绳子的交叉处，又重新贴上封条。谢富治还要我在封条上签上名，确认是金某某封上的，别人没有动过。

跟着谢、吴、傅三位一起来的秘书和其他随从人员，把这两包资料小心翼翼地分别装进两辆“吉姆车”的后盖里。小心翼翼是怕把有我签名的封条撕破了。一溜三辆“吉姆”、两辆伏尔加开出了“红旗大院”。

“罪证”取走了，保险柜的门开着，里边空空荡荡的。

我呆坐在办公室里望着保险柜发愣。别的什么也不知道了。

和今天一样，我正等待临头的大祸。

两天后，1967年5月22日上午，当时在中央文革办事组工作过的一位工作人员，非常高兴地特地赶来告诉我：老迈，没事了，全部处理完了，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不会再有任何事情了！

“没事？”我问

“绝对没事！”他说，“前天不是从你那儿把两包资料拿走了吗，我们开着车……”

他是在场的一个工作人员，他详细地向我叙述了“绝对没事”的全部过程。

……我们一溜五辆小车直接开进了中南海，进到一个院子里，“三号首长”早就等在那里了。下了车，正想去搬那些资料，“三号首长”告诉我们，不要打开汽车的后盖，也不要动那些资料。

“三号首长”让秘书打了两个电话，一个是请叶群同志来一趟，说有要紧的事情，请她马上就来；一个是让中国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派两位摄影师来，还叫带上摄影机，立刻赶来。

等了好一会儿，该到的人都到了。

“三号首长”跟叶群说了几句什么，好像叶群同志也点了点头。

“三号首长”又让摄影师把摄影机架好。两台摄影机，一台对准吉姆车的车后盖，一台拿在手上跟拍。他嘱咐摄影师，镜头不要切断，要用长镜头把整个过程全部拍摄下来。

摄影机已经吱吱响了，我们才去打开汽车的后盖，取出那两包资料。跟拍的那位同志很机灵，把镜头凑过去，拍了一段封好封条的特写。然后镜头跟着资料，一直跟到就在旁边不远的的一个化纸炉旁边。

化纸炉的炉门已经打开，火早就点燃了。镜头一直跟着，两包资料先后一包一包地丢进了炉膛，两包资料燃起来了。我们没有关炉门，一直看着它燃烧。镜头也一直对准燃烧的火苗。资料变成了火，资料由火变成了灰，烧着烧着快灭了，资料已经完全化作灰烬。

一位工作人员拿一根长棍在炉膛里搅了搅，升腾起来的全是火星。这时才把炉门关上。

“三号首长”对大家说：“这是谢副总理……”

谢富治赶忙插话：“不是我一个人去的。”

“三号首长”接着说：“这是谢富治副总理，吴法宪副总参谋长和傅崇碧司令员刚才从文艺组金××那里取来的两包资料，密封签没有撕开，也没有损坏，上面有他的签名，签名也是完好无损的。里面是些什么，我们没有看过，我们谁也不知道。大家都看见，资料已经当着我们大家的面销毁了。”

“三号首长”挺严肃地说完，大家都跟着点点头。

“三号首长”又补充说：“今后，在场的所有人，我们，相互作证。”

……

你说还有什么问题？没事吧？都烧成灰了，绝对没事！你放心，我亲眼看见的。

——他结束了他的叙述。

我和他关系不错。我谢谢他来告诉我这个事。但我的心不仅放不下来，反而揪得更紧了。

中央领导人对那些资料尚且不敢沾不敢碰，对销毁的过程，如此慎重，如此认真，这足以说明问题的严重。这也正说明：大祸已经临近。

在场的领导人和工作人员可能都没事，而我……这不，转移到秦城来，一蹲就是这么多年。

从他的叙述中，我进一步进一步地感受到首长真是厉害，就那么点旧剧照旧杂志，看把人折腾的。是啊，除了个把人，谁都不敢沾她，她让谁都害怕。谁敢不怕呢？

当然，我也感受到，“三号首长”到底是“三号首长”，真不愧为“三号首长”，处理问题细致、稳妥、认真、周到，实在高明。

□ 摘自金敬迈《好大的月亮好大的天》，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1月第一版127—130页

~~~~~

【史料存真】

周恩来的“政变经”

• 余汝信 •

笔者今年2月发表的《林彪“5·18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一文，在论及1965年下半年至1966年8月中共“防止反革命政变”一事时称：“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周处处亲力亲为且并非没有讲话，在林彪‘5·18讲话’后第三天的5月21日，周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就讲了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这是有案可稽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

近日，有友人认为笔者提及周恩来的讲话所言过于简赅，建议是否再加以阐述，当然，能转刊周的讲话全文，则更能说明一切。

所谓“政变经”，是套用批林者的说法。准确地说，应该是“防政变经”、“反政变经”，林彪“5·18讲话”的要旨是“防政变”而决不是“政变”。“防止反革命政变”及随之成为实证例子的对彭、罗、陆、杨“四大家族”（周恩来语）的揭发批判，是当时毛泽东灌输予中央的思维定势，并使之成为整个中央政治局常委班子的共识，不是林彪个人的发明创造。以解决彭、罗、陆、杨为主要任务之一的1966年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主持者是中央常委刘少奇（受正在南方的毛泽东所委托），常委之中，周恩来、林彪、邓小平都讲了话。林彪“5·18讲话”开头第一句就说：“本来是常委其他同志先讲好。常委同志们让我先讲”，让林先讲，并不等于其他人不讲，林讲话之后，周恩来于5月21日、邓小平于5月25日均分别在会议上讲了话。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有无正式发言，至今我们不得而知，目前所知的刘少奇关于彭、罗、陆、杨问题最详尽的说明，是其于当年6月27日在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1）

林彪“5·18讲话”全文，中共中央于当年9月正式转发，文革期间流传甚广，“9·13事件”之后也就成了批林的箭靶。而据目前所知，周恩来、邓小平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刘少奇在民主人士座谈会上的讲话，均未见中共官方的正式转发件。故此，长期以还，歪曲史实者似乎有了可乘之机，造成的假像是似乎世界上根本不存在有周、邓、刘与林彪观点相同、论调一致的言论这么一回事，即使是比较严谨的文革史著述，在对林彪“5·18讲话”大加鞭挞的同时，对周等人的讲话也是避而不谈，未着只字。（2）

中共正式出版物首次公开承认有周恩来的讲话，是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纂的《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中一条简短记载：“5月21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3）惟要参阅周讲话全文，目前还只能求助于文革中群众组织的出版物。

据笔者个人所见，刊载有周“5·21讲话”的群众组织出版物有两种，一为青海八·一八革命造反派联合委员会宣传组编印的《资料选编（中央首长讲话专辑）》（1967年12月5日）；二为湖北省直红司综合战线司令部编印、钢工总新华印刷厂兵团综合车间分团翻印的《重要学习材料汇编》（1967年11月）。两者文字内容基本相同，惟湖北版中一些人名如刘少奇、胡乔木等用了XXX代替，而青海版用的是原名。两相比较，以青海版较佳（可能还有更好的版本，惜笔者未寻到），以下随文转刊用的是青海版。原文有一些加括号的插话和注解，转刊时已将其移到本文注释处，原文括号内的注解过于简略、不易明了的，笔者已重新加注，特此说明。（2004年10月）

周恩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六六年五月二十一日）

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

一、主要讲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同意许多同志的讲话。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讲的很好。社会主义国家在党内和国家内部必然要有阶级斗争的反映，特别当前我们的历史时代是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走向没落，

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时代。列宁早就讲过：“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之后，资产阶级是要反抗的。资产阶级的力量比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多少倍。”“小生产者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主席说要宣传这两点，要经常温习，要经常宣传这两句话，温习这两句话。……

什么叫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陆说：新中国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么能这么说？不能这样讲，该叫什么呢？新旧知识分子。我们学校培养出来的人也是要分化的。从学校出来到社会上也是两头小中间大，少数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少数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多数是中间状态的。经过实践考验，是要不断分化的。在一定条件下，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也要分化的，有的完全变坏的。大庆的知识分子是劳动化的知识分子，但是不巩固，换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也会发生变化，也会变坏的。总之是不能象陆定一所讲的那样一律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们对老知识分子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包下来的政策有好处，有坏处。坏处是使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各方面窃取了领导地位，夺取了领导权。可以看出产生修正主义国内原因是主要的。“物必自腐，而后虫生之。”林彪同志讲的亚非拉地区六十一次政变，也可以看出国内因素是主要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时期，存在着阶级斗争。主席在七届二中全会就讲了“糖衣炮弹”，一九六二年十中全会就讲得更明确了。一九六三年四清至现在发现基层有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可以看到一个地方，一个部门，一个时期，修正主义可以成为当权派。这次在中央揭发的彭、罗、陆、杨，是中央领导机关走资本主义的当权派。看起来出修正主义不可避免，中央地方都会出现。说哪个国家的工作做得很好，不会出修正主义，是不对的，这就忽视了左、中、右的客观存在，这就是“一潭死水”。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我们的三防与陆定一的三防不一样。（4）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与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重点放在内，在上，主席说过，社会主义也会出修正主义，有两种可能。出修正主义是不可避免的，总是要出来。

（1）一种是搞政变。搞资本主义复辟，然后再推翻。资本主义革命也是这样，经过一二百年的时间，英法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是这样，经过封建势力多次复辟。这样时间长，困难多，象苏联现在的情况。在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也可能长，也可能短。中国有革命的传统，中国出了修正主义、修正主义上了台怎么办？地方可造反，主席是有预见的，是天才的预见，主席早就有感觉，早有材料，感觉是正确的，主席抓得准，抓得狠，抓得不准不行，二月七日那个提纲，五天之内就抓住了，抓得准、抓得狠、抓住不放，不能叫滑过去。“四大家族”已经夺了我们许多阵地，主席说过，这是党内正常现象，去年工作会议时就问地方同志，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造不造反？提纲出来后，主席说你们改不改，不改我就发动地方改，叫地方造反。彭、罗的问题可以发到县、团讨论，以后逐步深入到群众中去的。

（2）另一种是不断地清除修正主义，“剥笋”不断出现，不断清除。出是肯定的，出来后可采取剥笋的政策，这样可以避免修正主义复辟，这就是我党当年对国民党的政策。一九二七年以后，国民党分成左、中、右派，中间的转化为右派的剥笋，但并未实现这个政策，现在用到无产阶级专政，直到共产主义实现，这是发展规律，如新中国成立以来，一次是高饶事件。二次是彭、黄、张事件，（5）“四大家族”是第三次了，对他们都是采取剥笋政策，修正主义不可能得逞，使我们国家不出修正主义。主席说：“他们得支气管炎，吃五十片药就消灭了细菌”。事情是两种可能，或者我们被他们打倒，或者我们剥掉他们。（6）前后三次事件都是结合起来的，彭和高都是个人利害冲突，不消除他们，他们的阵地会越来越大，这是很危险的。揭开“四大家族”，夺回他们所占有的阵地是剥笋政策的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应该庆祝。现在世界上有些国家好象风平浪静，不采取剥笋政策，“死水一潭”是不成的，修正主义搞政变，基础是一文一武，掌握笔杆子、枪杆子，两个都占领了就动手，但最重要的是党权，彭是大党阀。防止修正主义窃取我们的党权，防止修正主义的重点要放在上边、中央、党内、国内。

林彪同志讲的那一段历史，一方面要记住政变之多，另一方面要相信北京出了政变总会有党、国、领导军队造（反）革命反的人，（7）要有信心，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团结在毛泽东同志周围，坚持不懈地采取剥笋政策，世代传下去。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解放以来三次事件的情况形式有所不同，都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高饶事件是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发生的，是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的。打的旗号是反刘少奇同志，在北京有两个司令部，是点阴风、烧阴火，是见不得人的。彭、黄、张事件发生在我们国家里遇到暂时困难，强调自力更生的时候，矛头直接指向毛主席。彭是高山倒马桶，臭名远扬，激起公愤，彭、罗、陆、杨的问题，早有察觉，不能与那三个人相比，他自己成不了气候，只是抱了腿，彭、罗、陆都是得到有中央信任各霸一方，对彭是逐步认识的，对罗也是逐步认识的，罗是林总发现的，彭也是林总发现得最早，林总在东北讲的三句话最生动，最形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两面三刀，没有章法，本质是政治掮客，投机分子。他们是在国内外形势大好的时候搞起来的，他们三人在党内地位相当高的，罗实际上是国防部长（因林彪病），彭实际上是第二书记，邓小平对他很放手，为什么他还要伸手，他们是资产阶级野心家，从最近二十三条下达后，彭打出反左的旗号，完全取消四清的一条黑线，不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全世界处在大动荡、大分化、大改组的时期，毛主席的思想指导世界革命的意义越来越大，“三家村”、“前线”反党反社会主义出现在这个时期，他们采取相同的立场、思想、主张、目标是向党向社会主义地起进攻，进攻的目标是林彪同志，针对毛主席，首先砍掉毛主席的左右手，这不是偶然的，不是巧合，罗是大比武出现的，陆是夫妻老虎店发现的，他们的共同点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在这个时期他们出来反对林彪同志，因为林彪同志对毛泽东思想提得最早，举得最高，发挥最多，用的最活，做得最力。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林彪的讲话是最有分量的讲话。高举毛泽东思想，提出了活学活用，四个第一，这次文化大革命，林总于二月二日派江青同志去部队召开座谈会，彭的提纲是二月三日到七日发出的，这是鲜明的对照，一个高举，一个反对。罗的大比武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林彪同志的。陆的老婆从一九五九年罢彭德怀的官以后，一直到现在写了六年匿名信。有一个规律，他在突出政治高潮时写信也最多的。用公开的明信片写是发宣言式的。彭从去年十月开始包庇“三家村”打出了黑旗，主席说：“为什么迫不及待？”彭答不出。彭经常讲民主集中制，实际上是好话对着我们说，坏事背着我们作。罗的事情发生后，主席已经指出他的错误，他不去检查自己的错误，还去改罗的报告，（8）为罗打掩护，为自己谋出路。文化大革命最能暴露本质，就在这时候，杨尚昆也象热锅上的蚂蚁，经常打电话问，不到半年时间，“四大家族”原形毕露，事情不简单，斗争刚开始。我们的阵地一个一个地被夺走了，现在要一个个地夺回来。他们打着红旗，散布了大量毒素，他们是见不了天日的，我们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9）

三件事情有共同性，思想、历史、社会根源是共同性的，思想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整风是整别人不整自己，个人主义极端严重。彭、罗、陆摆出一副一贯正确有姿态，（10）骄傲自满，自高自大，从无自我批评。同主席和林彪同志从不谈东北的问题，个人主义胜过党性，对他提过意见的人，他恨之入骨，永远不忘。

陆根本不讲理，副总理要兼一个口，要他搞文教口，常常就不干，说我要抓大权。叫他兼管文字改革委员会，他也不干，因为胡乔木同志建议要搞文字改革委员会，只有个人主义思想，没有党性，没有阶级斗争，陆定一家是大地主，解放后他回家卖地卖了很多钱，他说把钱交给党了，自己用了一部分。他家是大地主从来未向我讲过，他没有改造的决心，厚道是有阶级性的，有党性的，对国民党蒋介石不能讲厚道。没有个性，只有阶级性、党性。他们缺乏全心

全意为会民服务，利禄熏心，私心太大，我字当头，地位越高，野心越大，他对自己历史从来没总结，只是总结别人的，把功劳记在自己账上，冒充正确，自夸有功，骗取信任。所以说他们从来不说自己的成份。几家是大地主，他们都隐瞒，不向周围的人讲。讲了有好处，便于改造。要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念念不忘突出政治，念念不忘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11）

他们有宗派情绪，明知邓拓是个叛徒，彭还要包庇，对邓拓、吴晗等的包庇要和文化大革命，四清联系起来看，要把剥笋政策世代代传下去，力争越剥越少。

二、领导与群众。

把领导与群众，领袖与群众结合起来。关于五人小组汇报提纲，在开会前彭真给我打过电话，提出几个字的意见，对通知他举了手表示同意的。他又给我打电话说：“背着、盗窃、造谣要去掉。”（12）这是三个关键问题，非写不行，不能取消，要写。这个文件发下去加以说明，主席同意，一个月以来，全国出现了好的气象。工农兵，革命的知识分子斗志昂扬，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章士钊写了“柳文指要”一百多万字，（13）主席说允许他出版，准备印出来批判，他又要求收回，重新修改。这个人能看到气候，是有眼光的。把毛泽东思想交给工农兵群众，这个力量是很大的，把定时炸弹挖出来，中央更加团结了，全党全国人民更加团结在毛主席的周围，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主席在1962年提出形势、矛盾、阶级，十中全会公报，1963年第一个十条。文化大革命，三线。1965年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次又提出文化大革命，中央要加强反修，这次上海市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作用，提倡大家学上海，要把毛泽东思想交给群众，为了剥笋，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武装群众。

三、保持晚节问题。

盖棺不能定论，火化了也不能定论，象瞿秋白就是一个叛徒，他临死时写了一篇“多余的话”，这篇讲话在香港的一个杂志上发表了，意思是说我应该参加政治活动，李秀成也是一个叛徒，李秀成的自供就看出了，戚本禹同志写文章批判过，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

毛主席的一家，毛泽民、毛泽潭，毛主席的爱人杨开慧烈士，这些人是真正的烈士，这才是领袖的家庭。“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消。学毛著，作笔记要和自己的革命历史联系起来，作总结，有的人摆样子，不读毛著，拿起来读一段就痛心了。要反回来读三十本书。

注释

（1）如下文所述，刘少奇这个讲话未见官方正式文本，目前仅可见于群众组织出版物，如由内蒙古话剧团孺子牛、红旗战斗队，广东韶关专区文化局大无畏战斗队，武汉话剧院毛泽东主义战斗团1967年2月编印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资料汇编·批判专集》，页102—104。

（2）王年一著：《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页9—20；金春明著：“一场侵淫溪谷的恶风——评1966年中共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见《金春明自选文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页436—454。

〔3〕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页32。

〔4〕陆定一在一封发自上海的给其妻严慰冰的函中谈及购手表一事，提到手表的“防潮、防震、防磁”三防功能，批陆时指是与妻联系的暗语。

〔5〕指彭德怀、黄克城、张闻天。

〔6〕原文此处林彪插话：不是他们剥掉我们，就是我们剥掉他们。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应贯彻到社会主义革命整个历史时期。想一想，不采取剥笋政策，不剥掉、不清除，我们的国家、党不知怎么样了。

〔7〕原文如此。

〔8〕指关于罗瑞卿问题的中央工作小组报告。

〔9〕原文括号内文字：少数人掌握是资产阶级。

〔10〕原文括号内文字：彭说他既非教条主义，又非经验主义。

〔11〕原文此处有一段插话：彭真说总理总讲他的社会出身，党内讲，党外也讲，真有点麻烦，讲得太频繁了。总理这样讲是榜样，警惕自己，改造自己。刘介梅不是由好变坏，又由坏变好了吗？

〔12〕指“5·16通知”指责彭真的“背着‘五人小组’成员康生同志和其他同志”，“盗窃中央的名义，匆匆忙忙发到全党”，“彭真同志有意造谣，对许多人说，主席认为对吴晗的批判可以在两个月后做政治结论”这三句话。

〔13〕原文括号内文字：很反动，是翻案的。

~~~~~

## 【微观历史】

### 周恩来三保康国雄

• 何 蜀 •

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周恩来书信选集》中，有一封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70年5月27日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的信，编者所加标题为“两事办好后告章行老”。信中写道：“康国雄事，可告陕西派人至汉中工业管理学校一查，如确实因群众茫然于历史知识而对康国雄实行专政，虽病不许治，病倒亦不许与家属通音信，未免过分。可许其回京至康妻陈泽琴处治病，病愈再另作下乡安置。”

此信在《周恩来年谱》中也有记载，只是日期略有出入，记作5月29日。

众所周知，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出面保过不少人，但主要是一些重要领导干部或各界知名人士。康国雄何许人，竟能得到周恩来专门写信保护？

《周恩来书信选集》对此信所加的注释中介绍：“康国雄，是四川银行家、企业家康心如之子。五十年代起，在北京机械学院任教。‘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于一九六九年随该校迁至陕西汉中。一九七一年因病回京治疗。一九七七年正式调回北京，在朝阳区职工大学工作。”

原来，康国雄当时只是一个普通教师。周恩来为什么会对这个无名小辈施以援手？

事情得从康国雄的父亲康心如说起。

#### ◇ 康心如与美丰银行

康心如，原籍陕西。他与大哥康心孚都是老同盟会员，积极参加了辛亥革命推翻清朝皇权专制的斗争。康心孚在五四运动时是北京大学教授，在操劳校务中病逝。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开始，康如如在重庆艰苦创业，将原由美国人主持的中美合资美丰银行全部美股收买，改为中资经营，几经奋斗，发展成为四川首屈一指的民营大银行，他也成为内地举足轻重的金融巨头，除去经营银行外，他还大量投资于民生轮船公司、四川水泥厂、重庆电力公司、重庆自来水公司等、被推举为重庆银行业公会主席。其弟康心之、康心远也各自拥有若干企业，在30—40年代，四川、重庆无人不知以康心如为首的康氏兄弟。抗日战争期间，康心如以无党派人士身份，被蒋介石指定担任重庆市临时参议会议长，并连任两届。在此期间，康心如倡议定重庆为陪都，并为发展大后方经济、推进抗战大业作了不少贡献，同时，他对当时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也给过不少无私的资助。

当年在重庆，周恩来与康家兄弟都有来往。康心之的女儿康岱莎是共产党员，跟周恩来一起从延安回到重庆，周恩来特意安排她留在重庆家中做她父亲的“统战”工作。周恩来还多次会见康氏兄弟等工商界人士，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

1949年底解放军接管重庆后，康心如被安排为西南军政委员会财经委员会委员。后又安排为重庆市政协常委，重庆市民建、市工商联副主席，全国工商联执委，重庆投资公司总经理等。

1957年2月，周恩来出访归来，到重庆短期休假时，专门去城里胜利大厦旁冉家巷看望康心远，康心远的妻子王棣华和胞妹王同华，跟邓颖超是天津女师的同窗好友。周恩来还对随从警卫的重庆市公安局干部说：

“我们党在困难的时候，康家美丰银行在经济上帮助过我们……”

到底帮助过多少钱？周恩来没有说，康心如也从来没有提起过。当天下午，周恩来还去了重庆市工商联，接见正在出席工商联代表大会的代表，在与站在前排的康心如握手时，周恩来感慨地看着他说：“你老了！”随后，周恩来到二楼“辅导室”，与包括康如如在内的工商联几位领导干部作了短时间的交谈。

不幸的是，康心如在此后不久的“反右”运动中误中“阳谋”，竟被划成了“极右派”，撤职降级（从行政十三级降为十七级）。后因病去北京治疗，在章士钊向周恩来反映有关情况后，获准迁北京定居。

#### ◇ “蒋介石的干儿子”

康国雄是康心如的小儿子，于50年代初期考入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学习，毕业后分配到

北京作教师，但是他有一个非同寻常的“历史问题”，使他长期受到审查和打击，即他被诬为“蒋介石的干儿子”。

此事的真相是：抗日战争期间，为躲避日本飞机轰炸，康心如在重庆南岸汪山上修建了别墅和防空洞，康国雄住在那里的时候，与住在黄山、常来汪山散步的蒋介石偶然相识，公务繁忙之余的蒋介石，很喜欢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学生，常跟他聊天，拉着他的手一起在山间公路上散步，并曾请他去黄山别墅玩过一次。此事本来与政治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在50年代初期“肃反”运动中却被人诬告，从此康国雄背上了“蒋介石的干儿子”这个黑锅，政治运动一来就要遭到审查，“文化大革命”中更是遭到一次次批斗，硬要他承认这个“罪名”。

因为康心如与章士钊是同盟会时的老友，当时康家认识的人中只有章士钊能向中央领导人直接写信反映情况，他们便请章老先生向周恩来反映，以求得帮助。于是，就有了周恩来三保康国雄之事。

#### ◇ 周恩来第一次指示

1968年6月，章士钊根据康心如的意思，为康国雄的事情写了给周恩来总理的信，信中反映（原文无标点）：“四川康心如、心之兄弟，公所习知。在文化大革命中，该兄弟为冲击对象，自不待言。经过两年之困心衡虑，不幸心之于半年前体不从心，先行淹歿；而心如奄奄一息，展转床褥，加以其子国雄，横遭蒋贼义儿之诬，禁不起老牛舐犊之忧虑，病上加病，又复祸不单行，小将们忽有康某为官僚资产阶级之谴责。因此不胜恐惧，致函于钊，求为转达崇阶。冀在万死之中冲出一条生路。情节原件俱载，恕不亲缕。惟公怜而生之，无任为友呼吁之至。”

这封信什么时候发出，周恩来什么时候收到的？不得而知。周恩来对此信所反映问题作出的指示，是在一年半以后。

1969年底“备战”高潮中，北京机械学院奉命迁往陕西汉中。这时正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接受审查的康国雄，因父亲康心如病逝，暂缓离京，料理完后事，于12月中旬被押到了汉中。

在康国雄动身赴陕西前夕，“专案组”一位同情他的黄先生私下告诉他，周恩来总理对他的问题，有指示传达下来，是当时的公安部长、北京市革委会主任谢富治，要市革委会副主任丁国钰向驻机院的工人、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传达的，指示共有五点。黄先生事后追记下来写给了康国雄，大意是：

- 一、对康国雄的家庭及其本人的历史问题，不予追查，一律按民主人士处理。
- 二、如果发现康国雄是蒋介石的干儿子，但未发现有什么严重的政治问题，不予追究；若发现其有严重的政治活动，要上报中央进行处理。
- 三、如发现有严重的三反言行，上报中央酌情处理。
- 四、对康国雄的家庭生活和工作问题要给予照顾。
- 五、要文斗，不要武斗。

这就是章士钊老先生就康国雄的问题第一次写信给周恩来后，周恩来有关保护康国雄的第一次指示。据说，机院“军宣队”为此曾一度考虑让康国雄留京待分配；在“清队”阶段，康国雄与其他受审查人员待遇不同，每晚可以回家住宿等，与周恩来的这个指示不无关系。

但是，当时正值“清队”高潮中，“阶级斗争”压倒一切，周恩来的指示未能得到认真执行。

#### ◇ 周恩来第二次指示和章士钊的叹息

康国雄到汉中后，由于长期受到审查、批判，不能很好休息，思想压力很大，健康状况恶化，出现了心慌、疲乏、血压升高等症状。他要求到汉中专区或县医院去看病，报告了几次才获批准。到汉中县医院检查后，情况不好，大夫建议他回北京治疗。

康国雄把大夫开的建议返京治病的证明拿给“军宣队”看，却遭到痛斥：“还想回北京？从今以后，不许看病！组织人批斗他！”

康国雄悄悄把不让他看病，还要批斗他的情况写信告诉妻子，要她再去找章士钊先生求助。请章老向中央代为申诉。

于是，章士钊又给周恩来写了信，他这封信中反映了两个人的问题，一是章太炎的门徒马宗霍要求从中华书局调回中央文史研究馆，二是反映康国雄的事，其中写道（原文无标点，△为潦草难辨之字）：“重庆康氏昆仲，系钊数十年来之旧友，其门风及一切祖素，皆与蒋介石一无旁涉，此钊所能确切保证者也。不幸抗战时期，康氏在重庆对岸之汪山置有别墅，每周末全家弟兄即归山休息一、二日。不料蒋贼亦采取同一办法，因不期与诸康同时至山，遂有康家儿郎与蒋相遇于途而被要遮不放之事。时康心如之子国雄年不过十一、二岁，钊该时亦正倚居山上交通银行宿舍，可知此种情况足资察证……纷扰期间。心如兄弟两人相继物化其家，以文化革命濒于结束，凡儿女等等有职位者俱遵照国家号召分别下放，于是国雄由北京工业管理学校（注：此为章老误记，应为北京机械学院）迁往陕西省汉中农村，此乃事势之所必然，国雄应须遵守。不料国雄转入新校之后，该校△△一口咬定他是蒋贼干儿，实行专政，有病不许就诊，劳累不许歇。三数月间，以致国雄病倒在校，音信不通。此时实际情况如何，该家属虽然无所知晓。国雄之妻陈泽琴是医生，现在朝阳区104干校医务室服务，号称能手。据陈流涕陈述，为此并求钊处代为向钧院恳请，可否暂将国雄调出汉中学校，交与该妻陈泽琴负责医治。一俟病有转机，再由该院发落。”章士钊并强调此事为“生死攸关之急迫重案”，“近一年来钊为病魔缭绕，迄未痊愈，手软发抖，执笔难艰，实已放弃笔墨不止半年以上……惟以事关生命，迫不得已，即手迹去幼儿涂鸦不远，亦不敢避。惟千万鉴谅是幸。”言词之恳切，至今读来仍令人感动。

1970年5月27日，周恩来根据章士钊的信，专门给国务院直属口军代表丁江写了前面提到的那封指示信。

但不知为什么，丁江没有把此信内容传达给北京机械学院军代表或机院上级单位第一机械工业部。据事后得知，丁江只是向机院军代表了解康国雄的情况，得到的答复是，康国雄有“三反言行”，正在接受审查。为此，丁江便未按照周恩来信中“两事办好后在告章行老”的指示办理，而自作主张向章士钊口头回复说，“康国雄无病，他有三反言行，现正在受审查。”

章士钊闻讯后，对康国雄妻子说，他曾向周总理反映过一百多人的事情，这是唯一的一次被顶回来。章老先生还惋惜地对康国雄妻子说：“你为什么不提前告诉我，国雄有三反言行呢？我可以在信上主动提及，加以美言几句！”

周恩来给丁江的这封信，交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后，就被束之高阁。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丁江被调回总后勤部接受审查，从此周恩来对康国雄的有关指示就更无下文了。

### ◇ 第三次指示和“五一六分子”的戏剧性命运

不久，“清查五一六”运动又轰轰烈烈开展起来了。康国雄又被说成是“五一六分子”。他急忙把情况写信告诉北京家人，要妻子找章老再向中央反映，强调他身体有病，要治病；“干儿子”的事并没有解决，他们还在用这个罪名整他。

当时，每个受审查的人都有一个“帮促组”，十几个人，天天进行“帮促”，即批斗、逼供。在康国雄那个“帮促组”召开的第一次“表态会”上，就要他交待为“五一六”做过什么事情。他十分恼怒地说，“‘五一六’是反周总理的。而我为了摆脱蒙受冤枉的困境，曾经求周总理帮助，我怎么会反他呢？这根本讲不通嘛！”他还辩论说：“你们总结‘五一六’分子有三大特点：一是出身好，我却是大资本家的儿子；其次，历史上无辫子可抓，我却一直被怀疑为‘蒋介石的干儿’；第三，造反早。而我在文革初期还在‘牛棚’里劳改。‘五一六’的这些条件没有一条与我沾边。”

但是批判他的人们诡辩说：“初期是这三个特点，由于你的能量大，所以‘五一六’又把你吸收进去了。”

1971年12月下旬的一天。机院教职工全体到汉中大学礼堂参加全院大会。康国雄也被押到会场参加大会。

在杀气腾腾的气氛中，一个已被分配到大连工作，这次专门抓回来的学生，在大会上作“交待”。他交待自己的所谓“五一六罪行”，并且说，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开过一次“五一六骨干会议”，其中有16人参加，他一个一个地指名道姓揭发，最后第16名，点到的是康国雄。

大会结束后，就立即要康国雄自己交待。康国雄拒不承认这个“莫须有”罪名，就要他详细写出“文革”中的活动，他不知已经交待过多少遍了，只好又回到宿舍，趴在床边，把写过的材料又写一遍。

不料，事情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那次大会后的第三天，也就是康国雄被点名为“五一六分子”后的第三天，他被叫去连部办公室。在座的有几个连部负责人和军代表。连长先例行公事地问康国雄问题交待得怎样了，然后打断康国雄的声辩，突然说：“院党委讨论了你的问题，认为你确实有病。党委作了个决议，同意你回北京治病。”

康国雄听完此话，顿时意识到，一定是周总理又有批示下来了！他立即恭敬而大声地说：“感谢党中央！”

连长问康国雄什么时候走，康国雄说，“今天就走！”

这样戏剧性的变化，当然引起不小震动。当天下午，办完回京手续后，康国雄拿着证明信，见人就出示，告诉他们，他要回北京了。大家都感到震惊。有人忿忿地说，“康国雄胡说八道……”还有人跑去连部质问，“你们把康国雄放走了？！”一时间议论纷纷，许多人到连部去提意见。出于无奈，连部只好召开了全连大会，就康国雄的问题，当众作出解释：“康国雄的父亲在新民主主义时期，对革命有贡献，康国雄的确有病，党有统一战线政策，按统一战线政策给予照顾；康国雄的问题并未了结，治病回京后继续审查。”

这种不能自圆其说的解释，当然不能平息众怒。“父亲有贡献，儿子有罪，怎么能抵消呢？”还有人说：“你们经常说，康国雄的病假条是走关系来的，为什么又承认他有病，同意他回北京治疗呢？”“回北京后，谁去审查他？”……

一系列问题，使连部领导和军代表处于十分尴尬的地位。

周恩来对康国雄问题的这次批示，也就是第三次指示的具体内容，康国雄是在返回北京后才知道的。机院留守处主任郑琦昌，把让康国雄返京的来龙去脉告诉了他。据郑主任说，开始是第一机械工业部打电话到留守处，询问该校是否有一个名叫康国雄的人，当得知确有其人，现在陕西汉中后，就转告说：“周总理指示：他有病，应回北京治病。”

郑主任立即打电话去陕西机院，传达此事。机院拒绝说，康国雄是“五一六分子”，正在受审查，不能放他走。郑主任只好亲自到一机部把此事作了汇报。一机部的军代表说，“不行，这是周总理亲自批示的，不能顶。”并把批示拿给郑看，上面明确写着：“如果有病，应让他回家治病。”

郑主任又马上打电话，向陕西机院党委报告。并向他们言明利害：是周恩来亲自批的，不能顶。因为这已是在“九一三”林彪事件之后，周恩来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更加提高。这一次，他的指示终于得到执行。

康国雄回到北京后，再无人审查、批判他。以后，他终于调回北京，先安排在朝阳区“七二一大学”，“七二一大学”撤销后，参加了朝阳区职工大学的创办。到80年代，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书信选集》时，要为周恩来给丁江的那封信作注，到处找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康国雄，但因章士钊原信将他的工作单位错写成“北京工业管理学校”，结果费了许多周折，好不容易才在北京朝阳区职工大学把他找到，直到这时，他才看到了周恩来当年写的那封保护他的指示信。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